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 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1840 — 1950

白凯 / 著 林枫 /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1840—1950》一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典范性的专著。该书资料翔实，文字优美，其近距离的细致观察改变了读者们对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看法。作者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极具说服力。她思辨性的分析对二十世纪早期现代国家形成进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奖辞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专
著
系
列

黄宗智 / 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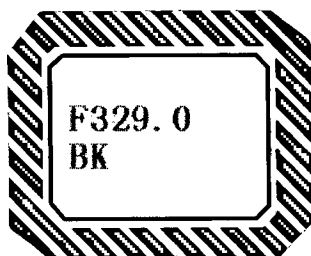
黄宗智 / 主编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 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1840 — 1950

白凯 / 著 林枫 /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

1840~1950/(美)白凯著;林枫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9

(乡村研究专著系列/黄宗智主编)

ISBN 7-80678-397-0

I. 长... II. ①白...②林... III. 长江中下游平原-地方史-研究-1840~1950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461 号

图字:09-2005-371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

白凯/著 林枫/译

责任编辑/王琳 技术编辑/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5.25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册

书号:ISBN 7-80678-397-0/F·5

定价:33.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丛书”总序

近十几年来,乡村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吸引不到优秀的青年人才。部分原因是西方工业国家本身基本无乡村可言,不那么关心乡村研究。近年的学术潮流也不像二三十年前那么重视踏实的基层社会研究。然而在国内,虽然许多先前成绩卓著的农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单位也面临着同样的再生产危机,但是全专业仍然人才济济,在社会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等领域又都有新的贡献;而历史学科以外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也有这方面的新人脱颖而出,并显示出新的研究动向。我相信,今后乡村研究和乡村学要发扬光大,主要动力必定要来自国内。乡村到底仍是中国国家的根本和大多数人的居在地。将来中国的乡村研究应该会领先世界。

我们提倡乡村研究绝不是出于排外性的本土意识,而是因为我们坚信真正世界级的学术贡献必定要既是国际化的研究,又具有一定的本土特点。国外的乡村研究有相当悠久、丰富的实证和理论传统,中国的学术研究必须与之交流,在国际学术和本土研究的相互作用之上建筑真正领先世界的乡村学。

本专著系列,将与《中国乡村研究》辑刊一样,从国内外的研究中择优出版。学术专著是建筑一门学问的基本砖石。高水平的专著既要有新的实证贡献,也应从其中提炼新的分析概念。实证研

究和理论概念的融合与积累,而非时尚模式、意识形态的引用或者简单的经验研究积累,才是提高一门学问的正确道路。

本专著系列寄希望于已经成熟的学术界同人,更寄希望于今日和未来的青年学者。凡是关心农村人民的高水平研究,无论学科与观点,都欢迎投稿。

黄宗智

致 谢

现在,我终于能够向多年来不断鼓励我、帮助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高兴之余,更多的还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导师莱曼·范斯莱克(Lyman Van Slyke)与哈罗德·卡恩(Harold Kahn)为我的学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极富激励性的培养环境,他们也为本书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指导意见,尤其是在关键性的初始阶段。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伙伴——埃米莉·霍尼格(Emily Honig)、盖尔·赫什阿特(Gail Hershatter)、海伦·昌西(Helen Chauncey)、兰迪·斯特罗斯(Randy Stross)——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光。在此,我还想表达对威滕伯格大学本科阶段诸位先生的感激之情,特别是斯坦利·米克尔(Stanley Mickel)、尤金·斯旺格(Eugene Swanger)、辛西娅·贝尔曼(Cynthia Behrman)、彼得·塞尔姆斯(Peter Celms),是他们最早把我引进了汉学与史学领域。

社会科学研究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对本课题提供了财力支持,谨此致谢。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得到了下列机构工作人员不遗余力的帮助: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库、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中研院、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南京市图书馆、苏州博物馆以及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

许多人援手相助,使得我在国外的研究成为一段得益匪浅的难忘经历。特别感谢顾琳(Linda Grove),她不但把我引入东京的学术界,还把我介绍给田中正人、佐伯裕吉、臼井佐知子、中山美绪,他们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南京大学的蔡少卿为我进入中国各图书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若非他的种种帮助,我在中国的停留肯定不会如此顺当。苏州师范大学(现苏州大学)的董蔡时慷慨拨冗,并让我分享他对太平天国占领长江下游流域这段历史的渊博学识。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日本、中国学者抽出时间,与我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对此,我不胜感激。

杰克·达尔(Jack Dull)、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肯特·盖伊(Kent Guy)、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王国宾(R. Bin Wong)阅读了不同修改阶段的全部或部分打印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尤其是周锡瑞,不畏艰难,历览数稿,对每一稿都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而且往往一针见血。一位清样校对员对最后修改稿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使我的论点更趋缜密;感谢缪里尔·贝尔(Muriel Bell)、约翰·齐默(John Ziemer)以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诸位,他们对打印稿进行了非常内行的处理;也感谢巴巴拉·姆努金(Barbara Mnookin),她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文字编辑工作。最后,我要向黄宗智——我最佳的思想伴侣、最好的评论家表示最深沉的感谢,感谢他的不断鼓励和全力支持,感谢他就本书中的重大历史问题与我展开的活跃讨论,使我豁然开朗。

白 凯

目 录

总序/001

致谢/003

导言/001

第一章

清代中前期的地主、佃户与国家/017

第二章

19 世纪 40 - 50 年代的民众反抗/061

第三章

太平天国对江南的占领, 1860 - 1864 年/119

第四章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重建工作与农村社会, 1864 - 1911 年/165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地主、佃户与国家, 1912 - 1937 年/227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民众反抗, 1912 - 1937 年/267

结 语/319

附 录/331

附录 A 1840 - 1936 年江南抗租抗税的集体行动/333

附录 B 赋税、地租与物价资料/343

附录 C 江南人口/348

参考文献/356

附表目录

正文表

表 2.1

1753 年的全国田赋
(每亩平均地丁银数加上每亩平均漕粮数)/064

表 2.2

1798-1856 年常熟县以棉花计算的田赋负担
(最普通等级土地的每亩税率)/070

表 2.3

1798-1856 年常熟县以稻米计算的田赋负担
(最普通等级土地的每亩税率)/071

表 3.1

江南 127 位乡官的身份(%) /141

表 3.2

1860-1862 年常熟县南部的田赋负担
(每亩稻田的税率)/157

表 4.1

1872-1909 年通行兑换率、米价和苏州地租折价
(指数:1892-1896=100)/205

表 4.2

1879-1909 年江苏东南部货币兑换率和地丁折价/213

表 4.3

1879-1909 年江苏东南部米价和漕价/213

表 4.4

1879-1909 年江南米价、棉价及田赋/215

表 4.5

1879-1909 年江南米价、棉价及田赋指数
(1892-1896=100)/216

表 4.6

1879-1909 年江南实际赋税负担的百分比变化/220

表 4.7

1798 - 1909 年常熟县田赋负担
(最普通等级土地的每亩税率)/221

表 5.1

1878 - 1936 年苏州的实际地租
(实租以每亩 1.0 石计算)/255

表 5.2

1912 - 1936 年苏州的米价与租栈折价(时期平均数)/256

表 6.1

1840 - 1936 年江南的集体行动/270

表 6.2

1912 - 1936 年江南佃户集体行动参加者人数/286

表 6.3

1840 - 1936 年江南佃户集体行动的目标/288

表 6.4

1912 - 1933 年江南米价与棉价/296

表 6.5

1912 - 1933 年江南的田赋
(最普通等级土地的元/亩)/296

表 6.6

1912 - 1933 年江南米价棉价与田赋指数
(1915 - 1918 = 100)/297

表 6.7

1933 - 1934 年江苏东南部和北部田赋收入
在县级预算中的比例(千元)/302

表 6.8

1933 - 1934 年江苏北部和东南部各县的
田赋与县级收入/304

表 6.9

1912 - 1933 年江南实际赋税负担的百分比变化/305

表 6.10

1903 - 1933 年吴县和无锡县田赋占稻米收成的百分比/306

表 6. 11

1753 年和 1933 年江苏东南部的田赋负担/308

表 6. 12

1929 - 1935 年平湖县田赋占地租的比例(稻田)/311

附录表

表 A. 1

1840 - 1859 年的集体行动/334

表 A. 2

1873 - 1911 年的集体行动/337

表 A. 3

1912 - 1936 年的集体行动/341

表 B. 1

太平天国统治下的江南田赋负担(每亩税率)/344

表 B. 2

1879 - 1910 年江南的米价、棉价、货币兑换率与田赋/345

表 B. 3

1872 - 1936 年货币兑换率、米价与苏州地租折价(每石米价、
每石地租)/346

表 C. 1

1820 - 1932 年的苏州府人口/348

表 C. 2

19 世纪 30 年代- 1932 年的常州府人口/349

表 C. 3

1795 - 1932 年的太仓州人口/349

表 C. 4

1816 - 1932 年的松江府人口/350

表 C. 5

1799 - 1933 年的嘉兴府人口/350

表 C. 6

1756 - 1928 年的湖州府人口/350

表 C. 7

1784 - 1928 年的杭州府人口/351

表 C. 8

民国时期江南农业人口的分布(百分比)/351

地图与图表目录

地图

图 1

清代江南全图/022

图 2

1842 年和 1846 年昭文县佃户暴动中遭到攻击的市镇/081

图 3

1850 年左右的太湖地区/092

图 4

1850 年左右的松江府和太仓州/096

图 5

民国时期的江南/230

图表

1797 - 1843 年元和、嘉兴两县稻田售价/074

导 言

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主要是靠向农民征收地租和赋税来维持的。仰赖于地主和佃户、国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有序关系,这一体制才得以延续。在 20 世纪中叶的变革中,地租被消灭了,政治经济结构转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否像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那样,这是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在负有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采取革命行动的结果?抑或如他们的贬损者所说的那样,是缺乏广大农民支持的一小撮阴谋家操纵的产物?

本书以商业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为讨论的焦点,得出如下结论:地租的消灭,与其说是农民群众或共产主义革命行动的结果,不如说是长期变化过程所致;这个变化过程早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使得地主这一精英阶层在结构性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

当前的研究方法

对中国共产革命起因问题观点不同的三大学派,本书的研究采取有“扬”有“弃”的办法。这三大学派的研究方法是: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道义经济的研究方法和所谓的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将革命归因于在商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简而言之,

这种观点认为,始于明代后期的商品经济的扩张,伴随着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入侵,导致农业人口明显分化为少数的地主和富农以及大量的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分化必然造成绝大部分农民贫困的加剧。一方面,他们得忍受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的支配;另一方面,他们还得忍受不断攀升的地主的苛敛。结果,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公开的阶级冲突升级了。因此,农民当然表现出非常乐意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的不满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根据这种解释,共产革命是农村阶级冲突激化不可避免的结果。^①

像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那样,道义经济的视角十分强调在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民生活日益不稳定。但是,在此动力之外,它还强调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向近代化迈进中的国家的作用。按照这种观点,农耕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并轨,以及国家干预的扩张,都严重威胁着农民在勉强糊口的水平上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第一个进程迫使他们与变幻莫测的市场力量联系在一起,第二个进程则加重了他们的赋税负担。与此同时,这两个进程还导致了乡村再分配机制的解体。在过去,这种再分配机制减缓了生存危机对社会中赤贫一族的冲击力。纯粹的市场考量取代了传统的道义责任。现在,因为失去了以往社会曾经提供的保护,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市场波动和不断上升的苛捐杂税的影响。就此而论,农民的集体行动基本上是一种防卫性的努力。农民在诸如中国共产党此类的革

^① 例如,胡绳就这么认为。这个体系也是李文治(卷1)、章有义(卷2、3)编辑的洋洋大观的三卷本原始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的编撰原则。

命纲领中所看到的是一个恢复道德社会和保障自己生计的机会，而非创造新社会的可能。^①

与马克思主义者和道义经济学家不同，市场经济学家坚决主张，商业化和与世界经济的并轨显然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计，并从而提高了农村生活水准。在他们眼里，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治愈的任何深层的结构弊病，而是因为一个或更多的直接政治因素的影响。蒋介石的国民党无法建立有效统治，中国共产党超乎寻常的组织能力，日本人在1937-1945年间的入侵和占领，都对革命的爆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②

上述每一种视角都有助于解释这里提出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本书注意到了阶级关系和地租问题；根据道义经济的研究方法，本书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田赋问题；根据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本书注意到了市场关系，特别是运用物价资料来评估地租和赋税所造成的实际负担。

然而，这些研究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单独用来解释19-20世纪江南事态的发展。^{*} 按理说，长江下游地区从一开始就应该成

① 这种研究方法在斯科特(Scott)《小农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叛乱和生计维持》一书中表述得最为清晰。作为该研究方法应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例子，参见马克斯(Marks)：《华南的农村革命：农民与海陆丰历史创造，1570-1930》和撒克斯顿(Thaxton)：《中国向右转：农民世界里革命的合法》。

② 认为中国商业化和与世界经济的并轨基本上属于有利影响的论据，可以参见马若孟(Myers)：《中国农民经济》、科大卫(Faure)：《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经济》、布兰德(Brandt)：《华中与华东地区的商业化与农业发展，1870-1937》。关于国民党无法建立有效统治、中国共产党组织能力的重要，以及日本人占领的作用，分别参见伊斯门(Eastman)：《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霍夫海因茨(Hofheinz)：《截断了的海浪：中国的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约翰逊(Johnson)：《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力的关系：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

* 清代，“江南”(江之南)一词指的是江苏南部的常州、苏州、松江三府和太仓州，以及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杭州三府。